

• 学术争鸣 •

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美] 本杰明·艾尔曼

(普林斯顿大学 东亚研究与历史系, 美国)

[摘要]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作者认为,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存与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却以庄存与的《易学》来作掩盖。同时,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关键词] 经学 公羊学 常州学派 庄存与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这样的主张,即研究常州庄氏的《春秋》学,一定要同和珅擅权乱政的政治背景结合起来。之后,我的友人陈祖武先生和汤志钧先生相继撰文,分析过和珅与庄存与的案子,然而他们还是大多依靠清朝的官方资料,如《清实录》等来分析,忽视了士大夫撰写的私家资料。^①因此,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于和珅同庄存与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充分的。最近,我先后读到了浙江大学徐立望博士和友人王俊义教授的论著,^②深感有必要对以往讨论的问题进行重新考察。

为了有助于问题的深入讨论,我将若干重要史料罗列如下:

1.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

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③

2. 汪喜荀《庄葆琛(述祖)家传》:

乾隆丁酉(1777)举江南乡试,庚子(1780)成进士。相国阿文成公以君故入子,欲罗

[收稿日期] 2009-02-15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与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文史研究院“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讲席教授”。

* 首先要感谢我的前辈汤志钧、陈祖武和王俊义教授。也要感谢台湾的王志弘先生很早以前所作的中译和钱永祥先生的校阅。同时也需要感谢这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杨艳秋先生和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徐立望先生的帮助。最后对我的学生陆海默的修改工作表示谢意。若有错误,当然须由我本人负责。

① 见陈祖武著:《常州庄氏学渊源之探讨》(<http://www.docin.com/p-315417.html>) ;见汤志钧著:《庄存与年谱》,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

② 见徐立望著:《嘉道之际扬州常州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见王俊义著:《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借鉴》,《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魏源集》,第236—238页;黄象离增补重编《古微堂集》,宣统元年(1909)国学扶轮社印行;《古微堂内集三卷外集七卷》,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刊本。

致之，避嫌不往谒。时和相用事，阿公之门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君。殿试卷已拟进呈，后卒置十卷后。引见归班铨选，君遂归奉母以居。先是于经学外制词赋，以不入翰林遂弃去，从事小学，治许氏书……

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同时记名者必候和珅门，叩头桥前，独君与云南知州屠君绅不往。屠君以知州升通判，实则降一阶，君记名签为和珅所撤。仁宗亲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补入，而君已乞终养。君以进士家居时，相国梁文庄劝君应召试官山东。时毕抚养部元以同知荐，以辞不就。嘉庆丁巳（1797）岁，奉彭恭人归里，色养著书，未尝一日离左右，凡十六年。^①

3. 董士锡《易说序》：

庄先生存与以侍郎官于朝，未尝以经学自鸣。成书又不刊版行世，世是以无闻焉。嘉庆间，其弥甥[弥孙]刘逢禄作公羊释例，精密无偶，以为其源自先生。^②

4. 朱珪《春秋正辞序》：

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

前辈少宗伯庄方耕先生，学贯六艺，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即以经学受主知。群经各有论著，斐然述作，遂造其深。率焉简札，必衷于道。畴昔之岁，与余同官禁近，朝夕论思，无间术业，……^③

5. 庄存与《春秋举例》：

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辞繁而不杀者，正也。

一事而再见者，先目而后凡也。

见者不复见也。

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

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

择其重者而讥焉。

贬必于其重者。

讥始，疾始。

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④

6. 庄存与《春秋正辞》：

禁暴辞第七，亡国之墟有数，可谓悼惧……

八、争逆德也。兵争之末，战兵之末。一跌不振，更事知之，其事好还，识古觉焉。圣人之心不宁，唯是仁而已。仁为让本，以仁去利。让为礼本，以让去争。礼为国本，以礼去兵。苟不务仁，不能去利，去兵无益亡之道也。……《论语》不云乎，放于利，而行多怨。此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非告以不善变而之善之道乎？不仁不让，争利害则必战，争是非则亦必战，为恶不同，同归于乱。^⑤

7. 庄存与《春秋要指》：

《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

① 载汪喜荀著：《且住庵文集》，世界书局影印本。

② 载《味经斋遗书》卷首。

③ 载《味经斋遗书》卷首，序撰于嘉庆六年（1801）。

④ 《皇清经解》，6.3991—3992；英—CPK；《味未经斋遗书》，道光八年（1828）刊本。

⑤ 《皇清经解》，6.3967；英—CPK，第115页。

言。《春秋》书天人外内之事有主，书以立教也。然后多连而博贯之，则王道备矣。

国不可以无受，贵受命也。无受则篡，公羊子之义，纳入立皆篡也，何休氏传之矣。允哉！允哉！君位奸之伺也。是故《春秋》于生死授受之际，尽其防焉。^①

8. 庄存与《序卦传论》：

古之论治乱也，责人。人不能钦崇天道，而至于乱。以天正之，曰，此于天道，乃所为乱也。乱者不自知以天，然后知乱在人，不在天。后之论乱者，责天。天生斯人以致乱。以人听之，曰，此天之所乱也。乱者不自作，若天使之然。乱在人，而反以责于天。二者之说，疑似而难明。常并存于天下。……自上古以来，主乱之人，未有不堕命亡氏者，废兴存亡，上帝所以治万世而不乱也。……唯圣人受命于天，天命之，圣人终之。见其待也，不见其命也。^②

9. 洪亮吉《守令篇》：

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时，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为之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见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谓民生吏治者不复挂之齿颊。^③

10. 《碑传集·洪亮吉传》：

乾隆初政，所以克绍圣祖、世宗，渡越百王而使亿兆倾心如此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恽之故人也……又自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八年之中，权私蒙蔽，事之不得其平者，又不知凡几矣。千百万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矣，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④

11. 苏宗恩《洪北江全集序》：

而常州之学，尤甲海内，如张氏惠言之治郑虞易，刘氏逢禄之治公羊春秋，皆卓然一家之言也。^⑤

12. 吕培等《洪北江年谱》：

嘉庆十七年（1752），七岁：先生就外家塾……是岁，塾师为庄观五先生。

13. 《清史稿·洪亮吉传》：

而十余年来，其更变祖宗成例，汲引一己私人，犹未尝平心讨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珅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珅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协从，又因人数甚广，不能一切屏除。^⑥

14. 谭献《谭献日记》：

《春秋正辞》十卷，举例要指。先生书多未竟之绪，《正辞》往往有目有文，然而皆可推说。宗伯甘盘旧学，老成典型。经说皆非空言，可以推见时事，乾嘉之际朝章国故隐寓其中。读楚杀其大夫却宛篇，于身后大奸脱距，如有先见。得无入告嘉猷，有以开明睿知与？立言之效，于斯不朽。^⑦

审视上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庄存与和刘逢禄身处帝国晚期政治舞台的中心。相较之下，魏源

① 《皇清经解》，6.3992,3995；英—CPK，第115页。

② 《味经斋遗书》一，CPK，第143页。

③ 《洪北江诗文集》上，第40页，嘉庆四年左右。

④ 《碑传集》卷51,7a。

⑤ 载洪亮吉《洪北江全集》卷首，序撰于光绪三年（1877）孟夏，授经堂重刊遗集。

⑥ 《清史稿》卷356，列传一百四十三《洪亮吉管世铭谷际岐李仲昭石承藻》，第11310页。

⑦ 谭献：《谭献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谢谢徐立望先生将这个新的资料给了我。

和龚自珍则是边缘角色。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多源自 20 世纪学者的共识。

谁是庄存与？在视魏源和龚自珍为 19 世纪中国改革精神之代表的史学家笔下，他通常会在注脚里被提上一笔。谁是刘逢禄？在历史叙述中，他通常只是魏源和龚自珍的老师。然而，若细读常州庄家与刘家的历史档案、家谱和手稿，学者自会感到历史现象错综复杂。正是基于迄今所能见到的文献，我认为有必要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从而掌握清朝今文经学兴起的完整意涵。一旦观察视角转变，一系列新问题将随之出现。

庄存与转向今文经学的政治脉络是什么？庄家和刘家支持常州的今文经学派的社会作用是什么？这是我要仔细探讨的问题。

在 16 到 19 世纪间，常州的庄氏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宗族组织，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高，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大，作为书香世家，其学术声望亦煊赫非凡。庄氏宗族在清代共有 29 人考取进士，其中 11 人在三年一度的京师殿试上表现优异，顺利进入翰林院供职，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比如说，庄存与是 1745 年殿试的榜眼，其弟庄培因则是 1754 年的状元。刘家亦涌现出 13 位以上的进士，其中也有多人进入翰林院。

庄刘两家有姻亲关系，合为一个宗族来看，在清朝就有 42 人担任高官。乾隆中期，他们在地方与全国政治圈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刘纶是清帝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而庄存与则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刘纶和庄存与安排了刘纶之子刘召扬和庄存与之女的婚事，是为当时地方和全国最重要的一桩联姻。刘逢禄——这桩婚姻所出的长子，在 19 世纪初期为庄刘两家赢得了学术上的领导地位。

然而，奇怪的是 1780 年后，庄、刘两家逐渐远离了北京的帝国政治舞台，专注于家乡的家族事务。两个常州宗族在 1788 年庄存与去世到刘逢禄成名的二十年间都退出了全国舞台，为什么？刘纶之子刘召扬通过了乾隆皇帝于 1784 年南巡时诏办的特别省试，获得第一名，而且年迈的皇帝也很高兴逝去已久的重臣之子表现优异。刘召扬之兄刘跃云在这之前就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进士，进入翰林院，之后又担任大学士。但刘召扬从未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跟妻子庄氏、儿子刘逢禄留在常州，满足于教学著述的生活，为什么？庄存与的侄儿庄述祖，在生父庄培因早逝后由庄存与抚养，1780 年通过了殿试，但返回常州后就没有担任官职了。他成为著名的民间汉学家，同时照顾寡母。这是纯粹出自孝心还是另有原因？

庄存与在 1765—1775 年转治《春秋》公羊学，有著作传世；1786 年致仕，正好跟庄刘两家退出全国政治舞台的时间吻合。这使得谜团更为复杂了。庄存与是乾隆晚期满洲头号政治家之一阿桂的密友与同事，阿桂曾试图吸纳庄述祖为属下，但庄述祖宁愿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在 1780 年通过考试后，庄述祖还是隐退过起了学者生活。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庄述祖将他的今文经学传给刘逢禄，刘逢禄小时候曾随外祖父庄存与学习直至庄存与 1788 年辞世。因此，刘逢禄的今文经学实为集庄存与的公羊研究和庄述祖汉学之大成。

1983 年春天，当我翻阅收藏在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的魏源《古微堂文稿》的手稿时，庄刘两家退出北京政治舞台的谜团终于可以解开了。《魏源集》的编者曾经采用这些手写资料来编纂广为流传的两卷本文集。这些文稿里包括了魏源替庄存与 19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文集《味经斋遗书》所写的序言的两个稿本。在这两个稿本里，魏源追记庄存与作为“真汉学者”的为学历程，指出他没有落入清朝大部分汉学家的琐碎训诂的窠臼。不过，在其中一个稿本里，魏源写到了政治方面的事情。魏源描述庄存与在担任朝廷重臣的后期，如何同恶名昭彰的满洲宫廷侍卫和珅共事皇帝。和珅在 18 世纪 70 年代晚期后，凭借贪赃枉法营建起一个私人帝国，规模为晚明宦官乱政以来所未有。魏源写道，庄存与跟和珅不和，且庄存与在这段抑郁的年代里所做的经籍研究，充满了对和珅个人权势膨胀的失望和忧虑。

再考量当时文人对和珅政治腐败的激烈反应的其他证据后，这个重要线索就更有意义了。这

股反对势力，正好是由庄存与的满人朋友阿桂以及一批来自常州的文人所领导的。首先，《魏源集》收录了提到和珅的稿本内容，却没有注明《味经斋遗书》序言中有关和珅的部分被删去了。换言之，即使到了道光初年，魏源仍不敢公开议论和珅事件；或是庄家成员要求在序言中不要提及这一敏感话题。然而，重读庄存与的作品，可以理解和珅事件的政治余波，这乃是解释庄存与为何从《春秋》学转向《易经》和非正统的《春秋》公羊学的重要线索。藉着经学的遮掩，特别是孔子褒贬传统的历史掩饰，庄存与间接地表达了他对时政的批判，以及他对和珅及其同伙的不满。虽然庄家有能力在早些时候就出版这些作品，但它们直到庄存与死后的近四十年才面世。

稍后，汪喜荀在《且住庵文集》中讨论了庄述祖的生平，这使得和珅事件对庄刘两家的影响更为清晰了。例如，庄述祖 1780 年的殿试考卷原本名列前茅，完全可以像他的父亲庄培因、伯父庄存与一样直接进入翰林院。但是和珅的同党唯恐阿桂在翰林院内多一位同僚，便将呈给皇上的试卷打乱了次序。庄述祖的试卷被放在二甲之中，因而失去了进入翰林院的机会（皇帝通常只亲阅前三名试卷）。庄述祖从政坛退隐，部分原因是面对黑暗宫廷的反应。

同样的，刘召扬在 1784 年通过特别考试后，决定留在常州执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和珅的权力高涨。1784 年后，对手已到了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其淫威下生存的地步。在这种情势下，刘召扬决定不跟随杰出的父亲和岳父的脚步，这不仅代表他自己的立场，也是庄刘两家的立场。因为他们如果直接反对和珅及其同党，势必给家族带来灾难。在混乱腐败的年代里，有目的地适时退隐成为儒家传统，庄存与在他的《春秋》研究里重新发现了这一点，庄刘两家在他们的宗族里延续了这一传统，直到和珅死去。

反和珅的领导人之一是翰林洪亮吉，他在 1799 年上呈嘉庆皇帝的有名谏疏几乎要了他的命。洪亮吉是常州人，幼时曾在庄家私塾学习。洪亮吉的妻子也是庄家人。因此，洪亮吉在嘉庆初年（乾隆皇帝当时退位为太上皇）参加了阿桂的反和珅联盟，这一背景与常州有“关连”。根据碑传集和守令篇的资料，洪亮吉于和珅被迫自杀之后给嘉庆皇帝的上书中，好几处提到了乾隆皇帝的早期顾问和常州士大夫们对于和珅建立贪渎帝国的震惊和失望。正是在洪亮吉上书的同时，嘉庆皇帝的教师和洪亮吉的朋友朱珪，替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作了序言。

谭献是浙江公羊学的一员，学术上十分推崇庄存与，对庄存与的学术深有研究，并且他同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又是好朋友，因此十分了解庄存与研究公羊学的原因。他这段话中的“大奸”，无疑是指和珅。很清楚，谭献认为庄存与撰写《春秋正辞》与和珅有很大的关系。

今文公羊经学兴起的政治时势是和珅事件，士人必须对这种明显违反王朝正当性的作为有所反应。其中一种回应是庄存与从初步的《春秋》学转向公羊研究，他将之传给宗族里的庄述祖、庄有可和庄绶甲，以及有亲戚关系的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探究庄存与的公羊学或刘逢禄的今文经学的细节，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的著作《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的第四至第七章。今天，从这个新角度来阅读庄存与的作品，我们会获得新一层认识。因此，我不赞成最近一些学者的意见，即庄存与的《春秋》公羊学出自乾隆晚期“大一统”的爱国心。事实上，乾隆晚期并不是一个需要这种空泛的古典主义口号的时代。

（下转第 140 页）

中得以完整的保留；但另一方面，从一段时期和某些区域看，村落是否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活力，以使我们在单向度的现代化面前依然有多样性的生活选择？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取帮助村落重建共同体的办法介入村落？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国情，广袤的村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耕地，村落短时间内的快速衰败，对我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带来损害，而我国各地村落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定型化，因而存在努力的空间。

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能就在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为发展的不均衡和各地村落的明显差异，部分村落是否可以在强势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国家政权建设面前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延续其积极的治理功能；甚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适当的努力，适当延缓村落衰败和村落自主性过快丧失所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或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部分激活某些传统资源比较丰富的村落以部分恢复或延续其自主性？毕竟，面对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

The Formational Mechanisms and Evaluative Logic of Village Independence

LIU We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an ideal view, traditional village has some independence that including self-providing public products, self-producing inter-supporting systems, self-fulfilling consumption, and self-maintaining inner order.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formational mechanisms of village's independence, we fi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m are so unique that they have connatural fragilit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of our country's villages has shown their logic of independent evolutio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should be reconsidered.

Key words: village independence; reason analysis; evaluative logic;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慧]

(上接第 63 页)

Reconsideration for Heshen's Relations with Zhuang Cunyu in the Late Qianlong Era

Benjamin A. Elman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America)

Abstract: Those who have recent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Zhuang Cunyu and Heshen have stressed the Qing "Veritable Records." Because Zhuang Cunyu's manuscript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ere written in the middle of the Qianlong era, scholars suspect that Zhuang's Gongyang studies were completed before the Heshen case and thus the rise of Gongyang studie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Heshen. However, why then would Zhuang Cunyu's stud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ave to wait until the early Daoguang reign before they were published in Zhuang's *Weijingzhai yishu* collection? Why weren't the manuscripts ever even see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Qianlong period? This delay raises some suspicions worth considering. My essay examines the rich non-official sources that allow us to understand the Heshen era more clearly. The author believe that not only are the Daoguang writings by Zhuang Cunyu on the Annals important sources, but literati writings are also worth analyzing carefully.

Key words: classical learning; new text studies; Changzhou School; Zhuang Cunyu

[责任编辑 陈文彬]